

自媒体舆论的泛政治化批判倾向之批判

程璐 黄明理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当前,泛政治化批判倾向在自媒体舆论中较为盛行,社会现象归因的过度抽象化、批判方法的形而上学化、批判话语的全盘否定化是其主要特征。这样的批判倾向会带来削弱党的凝聚力、助长网络民粹主义等不良后果。多种分配方式带来的收入与财富差距较大问题、网民高涨的批判热情与其不成熟的非理性的批判思维共生与助推、主流媒体价值权威性和感召力弱化、自媒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冲突是自媒体舆论泛政治化批判产生的主要原因。为了避免陷入自媒体舆论泛政治化批判的误区,必须建构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以增强人民对政府的认同、强化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精神以重树榜样形象,将提高主流媒体的自我批判精神与提升自媒体的辩证思维相统一,加强对科学理性批判观和辩证统一的权利义务观培养。

[关键词]自媒体 舆论 批判 泛政治化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全民参与社会治理进而为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造了技术保障和广泛的群众参与的民主基础。每个人都是舆论的主人,它克服了过去只有少数文化精英代表广大百姓发声之不足,为政治这一“大众之事”的现实化提供了空前广阔的空间和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的自媒体意识形态的任何表达都能有效地推动社会发展,由于“网络拟态环境带来的传播时空变化大大减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①,如今自媒体的泛政治化批判思维日益蔓延,其社会危害和政治危害不断显现。目前来看,学界对于自媒体舆论泛政治化批判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少,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互联网发展角度^②、传播学与政治学角度^③以及舆论主体的政治心理角度^④分析与论述网络舆论泛政治化批判倾向的生成背景与应对措施。但是,现有成果存在将网络舆论等同于自媒体舆论,将网络舆论的泛政治化倾向等同于自媒体舆论泛政治化批判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认识事物的前提和解决矛盾的关键,为此必须加强对自媒体泛政治化批判思维的深入研究,探索其校正方法,为凝心聚力实现中国梦创造和谐的政治氛围。

一、自媒体舆论泛政治化批判倾向:非政治原则问题政治化的僭越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社会事件经过网络传媒的讨论便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在当下的自媒体舆论中,网民对不同的公共事件的讨论越来越具有泛政治化批判的倾向。自媒体舆论泛政治化批判是一种被泛化、极端化的网络政治表达,这样的表达方式混淆了不同性质矛盾的本质界限,将社会发展因思想分歧、学术争论以及价值偏好等产生的矛盾简单地归结为政治原则问题而进行批判。自媒体舆论泛政治化批判的特征及其后果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对社会现象及其产生原因的过度抽象化。所谓过度抽象即自媒体舆论将社会热点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纳为抽象的政治原则问题。近年来,大众化的自媒体平台迅速发展,人类的网络化生活方式已逐渐形成,网络也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舆论场域之一。事实上,社会生活中许多冲突

[作者简介]程璐(1994—),江苏淮安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① 王赛、杜仕菊:《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样态呈现、诱因分析与治理策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② 参见许晓龙《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泛政治化”现象探微》,《电子政务》2015年第7期。

③ 参见李明德、李巨星、刘婵君等《网络舆情中泛政治化现象的动力机制与因应策略研究》,《情报杂志》2016年第4期。

④ 参见张晋宏、李景平、白东海《基于政治安全的网络舆情泛政治化治理研究》,《电子政务》2019年第8期。

的产生原因与应对方式并非政治原则问题,也并非需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道德约束、市场经济规律等自发秩序的运行便可起到调节作用,如果政治的边界被无限放大,反而会产生不必要的后果。但是,“头脑的激情”总是使一些人不去深究事情的真相和真正的原因,而是将批判的矛头简单地指向政府和党员干部,甚至上升为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和否定。例如,环保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环境污染是一个多因素长期共同作用造成的结果,因而面对环境治理这一问题,需要在掌握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但是泛政治化批判者利用自媒体舆论力量将环保问题引导成政治问题。而将环境问题上升成一种“政治正确”就泛化了政府的责任,一旦环境治理变成了一种“政治任务”和“政绩表现”之后,就很容易带来一些不计成本的政治行为,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这样抽象的归因方式,会造成看待问题的片面化和标签化,在解决问题时忽视问题产生的真正的具体原因,从而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甚至还会徒增新问题,即产生不应有的政治忧虑和怀疑。

第二,批判方法的形而上学化。所谓批判方法的形而上学化,即对复杂问题进行外部政治条件的简单化、联想化归因,将特称判断全称化或局部问题全局化。例如,将对个别党员干部腐败现象的批判上升为对整个党员干部群体的否定,将对社会生活中的不合理政策的批判上升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疑。诚然,个案能够表明问题的局部,但却不能代表全体及其本质,在网络公共事件中,一旦有官员腐败问题被爆出,自媒体舆论中便会出现“无官不贪、无官不腐”的评论。我们深知“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①。”倘若如批判者所论,那么,我国又是如何取得举世公认的“世所罕见”成就的?按照泛政治化批判的逻辑,我国正是在腐败分子的领导下取得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功绩,这种逻辑显然是荒谬的。这种批判方式背后的批判思维会将少数党员干部的不信任感上升为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不足,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最终形成社会性的政治信仰危机。

第三,批判话语的全盘否定化。自媒体舆论的泛政治化批判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非直接利益冲突”,它一方面反映社会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被认为是“弱者的武器”,另一方面这种异化的网络政治表达,带有泛化与极端化的全盘否定式批判特征。自媒体舆论泛政治化批判者习惯于站在政治道德制高点上,对社会现状做过于悲观的评价,将网络热点问题的产生原因简单归结为政治因素,并以理想主义高标准进行政治幻想,这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对社会现状和中国政治生态的否定。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突然爆发,网络舆论中出现一批欲将新冠肺炎这一自然灾害披上“人祸”外衣的泛政治化批判者,有些人将道听途说来的谣言随意放大,故意制造理想与现实间的对立,编造看似真情流露却戴有政治有色眼镜的日记,而这份日记不仅是对中国抗疫成果的否定,也最终变成了西方世界攻击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武器。再如,当我国抗疫取得了其他国家所难以企及的成效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将病毒政治化,散布政治病毒。还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故意隐瞒事实,数据不实,或者认为,中国的抗疫成绩是建立在专制和侵犯人权基础上的。而一些自媒体舆论不仅不积极用事实去驳斥这些错误的舆论,反而做这些错误舆论的传声筒和应声虫。

二、自媒体舆论泛政治化批判倾向生成的社会背景

政治本是大众之事,自媒体时代媒体主体的全员化趋势为政治民主化创造了空前的条件,而自媒体的政治批判又成为政治民主的重要表现。自媒体舆论由政治批判走向泛政治化批判的主要成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利益大调整时期,分配方式带来的收入与财富差距较大问题使得共同富裕理想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遭受质疑。如今,社会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新阶段,利益分化问题明显,新的利益阶层也在不断发展壮大。近几年随着低保、惠农等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推进,中国完成了消除

^①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页。

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但是贫富差距依然存在,相对贫困化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数据显示,2020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中,前20%的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96062元和38520元,前者是后者的2.5倍;城镇和农村后20%的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5597元和4681元,前者是后者的3.3倍。还有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基尼系数近年来一直维持在0.46—0.47之间,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的范畴,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由29.0%上升至30.6%^①。复杂原因带来的利益分化问题使得作为财富创造者的部分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成为财富的共享者,这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价值立场存在较大偏差,因而改革成效并未能充分转化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利益分配倾斜于资本方和公共权力使用方的倾向未能有效克服,利益权贵化倾向带来的公权私化、隐性腐败等问题使得政治精英形象和政府的公正性认同弱化。与此同时,“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因其利益实现程度不同对政府、社会政策和执政党的态度也不同”^②,这也是滋生自媒体舆论泛政治化批判的政治土壤。在传统媒体中,政治精英阶层一直都是其他阶层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也是意识形态信息的发布者,但是,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壮大,政治精英阶层的舆论主导与其他阶层被舆论引领的关系状态在自媒体平台上得到消解,大众成了舆论的参与者、传播者与主宰者。随着公权私化、隐性腐败问题在自媒体中不断被爆出,公众对政治精英的认同也渐渐出现了弱化的倾向,对官方发布的信息怀疑度渐增,更有甚者提出“三个凡是”即“凡是政府辟谣的就一定是事实;凡是官方发布的就一定有黑幕;凡是社会矛盾就一定是体制问题”^③。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公权私化加剧了百姓的不满情绪。一般意义上的公权力指国家权力,公权力在本质上是由人民赋予的,其职责是保障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发展公共事业、增进社会福利。但是,公权私化的现象如今时有发生,“公权私化是指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人员把公共权力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从而利用公权侵吞公共资源,侵害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④。当权力过大成为稀缺资源时,就会出现“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问题,从而使大众利益受损而满足少数人的利益。因此,将生活问题或社会问题简单归因为政治问题,往往是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深恶痛疾而在情绪上的折射。另一方面,隐性腐败滋生百姓仇官心理。近些年,传统的粗放式公职人员腐败因反腐力度的加大和反腐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而明显减少。但是,利用职务便利给个人和小集体谋取私利进而浪费国家和社会公共资源、损害公共利益的隐性腐败还时有发生,由于这些现象过于隐蔽,一旦被查处,其贪腐的数额之巨大和由此所形成的社会恶劣影响就非常严重。社会中相对弱勢的群体在心理上会因隐性腐败而出现不平衡,从而导致干群关系恶化,使得部分群众由对少数党政官员抱有不满意情绪而转化为对所有党员干部怀有怨恨心态。更有一些不法分子尤其是因腐败而被惩罚的利益相关者唯恐天下不乱,借社会事件蓄意抹黑和丑化党和政府形象,以发泄政治仇恨,造成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党和政府产生误解、怀疑、抱怨和仇视。当群众用这种消极心态去看待和评价网络热点事件时就容易陷入泛政治化批判的误区。

第二,网民高涨的批判热情与其不成熟的非理性的批判思维共生。在传统媒体时代,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成本较高,因而政治意见和利益诉求的表达欲望也相对较低。与此相反,自媒体时代人与人之间通过数字化形式的交流,基本实现了意见表达的零门槛,特别是当各类社会问题在网络社会中不断被曝光,人们的批判热情也随之高涨。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⑤在革命的辩证法那里,批判不是消极解构,而是扬弃,是积极的建构式批判。批判一旦缺乏理性而空有激情就会变成有害无益的情绪化宣泄。自媒体舆论泛政治化批判倾向就是一种

① 参见任泽平《中国收入分配报告2021:现状与国际比较》(2021-08-19)[2021-09-05],<https://mp.weixin.qq.com/s/BuSbw-m1sgKA3VHSuWw7QQ>。

② 王丽荣、李若衡:《社会分层视野下的政治认同——基于三种群体利益实现的视角》,《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③ 石平:《警惕网络负能量》,《求是》2013年第12期。

④ 张芸:《我国乡镇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研究——从公共行政的视角审视》,《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过分情绪化与主观化的非理性政治表达,例如骂街式、人身攻击式批判以及片面化、断章取义式批判,甚至是造谣、传谣式的批判。社交媒体时代,公众不再愿意盲从于专家权威,而是迫切地想要获得更多的知情权,但想要在铺天盖地的网络观点和故意而为的新闻制造中捕获真实理性的信息也变得愈加困难。因此,公众难免会陷入情绪在前、真相在后的状态中而不自知,在这样的状态下,由于情绪宣泄的需要,以及别有用心人士的煽风点火,谩骂嘲讽、扒皮人肉等极端的批判方式便占据了自媒体舆论。网络负面事件的舆论走向也会由对当事人的批判慢慢转变为对我国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指责和质疑。在批判者看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以及社会管理机关的政府,自然需要对出现的社会问题负责,因此很多时候党和政府也是“无辜躺枪”,甚至网络中一些为我国的体制政策辩护的声音也会被“极左警告”。诚然,这样的批判很多时候就是“三分钟热度”式的批判,随着公共事件网络讨论热度的下降,批判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弱,但是长此以往,这样的批判思维和方法必然影响人们理性客观地评价我国的政治制度。另外,封建传统思想中的政治依附心理和附庸意识在当今网民的思维中仍然存在,自媒体舆论中泛政治化批判的现象也是政治依附心理的现代表现。“有困难找党和政府”在自媒体的渲染之下,成为一种将社会矛盾产生原因全部惯性归责于党和政府的政治绑架。这样一来,一旦社会中出现了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也都被赋予了政治的色彩,都成了是由政治问题所造成的问题。总之,自媒体舆论的批判者正是利用大众的政治依附心理,自觉地将所有社会问题都归因为党和政府的问题,这也成为解决问题最便捷的思维路径依赖。

第三,网络意识形态价值多元化使主流媒体的价值权威性和感召力弱化。在自媒体出现之前,主流媒体主控舆论的话语权,意识形态是一元领导的同时也是一元主导,主流媒体的根本使命是从正面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其意识形态倾向是辩护性的。而自媒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主流媒体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垄断与控制,自媒体条件下具有多元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声音获得了现实的传播途径。为了吸引眼球以求得新闻效应和实现其获利目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批判性(党和政府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者,自然成为评判和批评的对象)声音渐成其舆论主调,又由于其完全不同于辩护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所谓新闻性而为大众所乐道。自媒体非主流意识形态经常使用碎片化的信息和非理性的思维方式来对比、解构、污名化主流意识形态。在与大众的沟通中,主流媒体更强调主流价值内容的传播数量和传播频次,而大众的参与度、接受度、满意度则容易被忽视,相关宣传很容易被当作政治规训而遭受怀疑。另外,主流媒体引导、调控自媒体舆论的能力较为薄弱,处理问题的方式多局限在被动回应上。从功能上来看,主流媒体的言论的辩护性特征使得其话语形式主要以非批判的形式存在,主流媒体相对严肃的传播内容也因此缺乏活泼的呈现形式,而自媒体舆论正好与之相反,通俗易懂的批判式表达更具有新闻性进而更容易吸引受众的注意并引发共鸣。

第四,自媒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冲突,造成其在对流量等经济效益的追求中丧失理性自觉与专业精神。如今,自媒体舆论失范现象严重,“黑嘴自媒体”对流量等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及非理性的话语传播方式,极易放大社会阴暗面,致使群众对党和政府产生误解,导致泛政治化批判的不良后果。自媒体平台是群众了解知识、获取社会动态的主渠道之一,但是仍然有不少自媒体为了博取眼球、获取商业利益而毫无政治原则立场,胡评妄议、传播谣言,在资本驱动下,毫无道德底线^①。自媒体的舆论失范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围绕公众关心的议题编造谣言,利用谣言所涉及议题的公共性、敏感性,刺激公众的神经,从而吸引转发和讨论;二是有选择地突出和放大公共事件中的部分事实,通过有意地选择将个案导向体制机制性议题,进而吸引网民围观;三是歪曲事件中特定主体的行动逻辑,并给其扣上污名化的帽子;四是习惯站在道德制高点肆意批评、侮辱他人的‘键盘侠’行为。”^②特别是当涉及重大公共安全的事件时,自媒体舆论十分擅长刺激大众敏感神经。例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部分自媒体炮制了很多类似灾难美学式的煽动性的文章,以唤起群

① 马中英、任平:《走向资本创新逻辑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兼论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及其历史超越》,《齐鲁学刊》2021年第21期。

② 巢乃鹏:《后真相时代自媒体言论乱象及规范》,《人民论坛》2020年第11期。

众共情能力为名,消费灾难博取流量。有的甚至通过污蔑国家治理政策来谋取私利。例如,某些网络课程教学网站撰写标题为《疫情再继续,2020年开学将有大改革!中小學生最倒霉,不重视可能会被淘汰》的公众号文章,从表面看来好像是政府在疫情期间制定的相关教育政策会让中小學生“倒霉”,仔细阅读发现这不过是有些售卖网课的自媒体平台恶意解读相关政策,其目的是更好地出售网课以获得商业利益,这样在特殊时期刺激大众敏感神经从而获得相关经济利益的行为在自媒体中十分常见。

三、自媒体舆论泛政治化批判倾向的纠治之道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的泛政治化批判倾向有着进一步蔓延和加重的态势,正确对待和应对这一问题,有助于增强政治认同维护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第一,建构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制度以增强人民对政府的认同,强化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精神以重树榜样形象。人民至上性政治立场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之中,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观是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的创新性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所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人民利益至上观,首先,必须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以增强人民群众的公平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提升的同时,不同劳动者的劳动及其获得的差异性也得到了尊重,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我国也因此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了经济的腾飞。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类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深层动力”^①。但是,随着利益观念和利益来源的多元化,传统的利益整合和分配方式并不能解决社会利益分化不断扩大的社会现状,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也带来了收入与财富的巨大差距,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使“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念受到质疑,在网络还不发达的年代,这样的怨言无法通过传统媒体极速大范围传播,但是如今自媒体却为负面情绪的宣泄提供了便利的场所。利益分配不公,除了表现为显性的收入差距过大之外,还表现为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这也是造成社会不满情绪产生的重要原因。当今中国,阶层固化风险扩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二代”现象也并非个例。“二代”现象是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一种畸形的代际转移和传承现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传递与世袭,阶层固化使得“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两者之间产生了难以逾越的身份鸿沟,大众对“强”二代阶层的仇恨其实就是对这一鸿沟的愤怒与反抗。所以,建立一个流动的动态型社会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人们的公平感才能提高,不满情绪才能得到消解,社会也才能在合理的流动中保持良性运作和动态平衡。其次,必须提高和改善民生以彰显社会主义的人道魅力。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资本主义异化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异化劳动的产生,劳动者无法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且受制于资本及资本家,因而资本主义在积累了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贫困,使自己失去了道义上的辩护权。而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认为社会发展应当以满足“现实的人”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现实的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即为民生。民生问题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问题,要求我们在不断的实践中推进美好生活需要的全面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②在我国,民生资源供给的差异性,使得社会弱势群体不能真正公平地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而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人,却以绝对优势享受着社会资源,这就致使部分民众产生了对党和政府还有国家未来悲观失望的心态,形成了政治审丑思维。这一悲观心态需要宣泄的渠道,开放性、匿名性、自由性强的自媒体便成了这些民众宣泄负面情绪的最佳阵地。因此,必须实现政府支出的结构性转型,将更多的公共预算用于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改善民生方面,压缩低效及无效的政府投资和行政支出。只有不断改善民生问题,让改革成果惠及于民,才

① 孟鑫:《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在新时代的指导意义》,《人民论坛》2018年第27期。

②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页。

能真正解决民众“仇富”“仇官”的心态,从而使得自媒体舆论更为理性。最后,要有效落实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精神。领导干部作为政治精英群体,掌握着较大的公共权力,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代言人。不可否认,极个别领导干部容易犯言行不一的错误,将为人民服务歪曲为人民币服务,考虑自我利益太多,关心百姓疾苦不多。这种现状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的整体形象,也严重消解了大多数党员干部兢兢业业为民做实事的正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群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远高于基层的相关职能部门,因而出于对中央政府的信赖心理以及“闹大”才能更快解决问题的心态,才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部分党员干部。因此,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来提升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与内在修养,真正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从而提高党员干部的认同度,从源头上解决百姓对党员干部的质疑与不满,避免自媒体舆论泛政治化批判的发生。

第二,加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学习,推动辩证唯物主义思维与科学批判观的树立。当前中国存在多元与多样化的思想文化生态,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叠加呈现,此背景下,批判成为当代中国时髦的甚至是主导性的话语方式。自媒体舆论中网民的批判性思维呈现出泛政治化批判倾向,是需要进行再批判的。首先,要努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修养,培育科学批判观。马克思主义批判观强调批判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批判观是站在公正无私立场上的具体而秉持科学和理性的批判观。除此以外,客观有效的批判还需要科学方法的保证。批判者本身需要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以及正确处理理性与感性情绪、科学批判与道德批判之间关系的能力。自媒体舆论泛政治化批判者的批判更多的是流于现象化和情绪化的批判,科学维度的批判被弱化,政治维度的批判即所谓的道义性的批判被无限强化,因此,这样的批判并不能实际地解决问题。另外,在当代中国,舆论越来越受资本操控,其经济理性、工具理性被无限放大,价值理性被轻视。与此同时,网民普遍缺少科学的思维理论武装,所以,表象化、情绪化、片面化的泛政治化批判才会存在滋生的空间。为此,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批判观教育,提升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理论水平,培育科学理性的批判观。其次,要树立唯物辩证的思维理念。唯物辩证的看待和分析问题才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途径,网络公共事件中充斥着各种假象、表象和谣言,让人很难看清社会问题的本质,如果想要真正揭示和抓住问题的实质就必须自觉运用好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思想武器,自媒体舆论泛政治化批判者更多的从个别网络热点事件出发将个别问题上升为普遍问题的高度进行批判,这样的批判看似是从事实出发,实则是从个别实例出发,个别实例并不具有最普遍最基本最能反映事物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属性的性质,而批判者却善于用以偏概全和泛泛之谈去放大社会阴暗面,这是唯物辩证思维缺失的表现,因此,应该积极培养辩证思维,提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

第三,培育主流媒体的自我批判精神,优化其网络舆情的应对理念,提升舆情应对能力。第4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较2020年12月增长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面对如此庞大的网民数量,开展行之有效的网络舆论治理,是缓解自媒体舆论的泛政治化批判的关键所在。社会治理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政府主导,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一项活动,网络舆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部分也应遵循这一原则。首先,政府作为主导部门及时更新舆论治理理念是增强主流舆论辩证思维以提升其可信度与权威性的前提。主流媒体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尊重人民的基本诉求,努力以真实的信息还原群众一个真实的世界,满足人民的知情权,摒弃封堵防等思维定势,尽可能地将相关信息透明化,这样既可以缓解人们的猎奇心理,也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从而降低网络泛政治化批判的发生频率。在网络舆论引导中遵循“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对不同的舆论观点予以包容,因为在网络时代,网络舆论很多时候可以被认为是“看得见的民意”,合理的争论不仅有助于达成舆论共识,还有利于培养民众的辩证思维,使网络舆论更趋于理性。其次,政府及主流媒体应不断提高舆论治理能力。通过对相关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对热点问题的敏感度,从而抓住舆情焦点、热点及民众最关切的问题,并找准时机主动回应,使主流媒体及政府的声音可以最及时最精准的传递给民众,进而主动营造清朗的舆论环境。同时,不断更新舆论监测分析方法,善用大数据和人

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手段。在拥有海量数据的大数据时代,我国传统的舆情数据处理技术在如此复杂的舆论环境中显得鞭长莫及,但事实上,利用大数据手段在舆情演进的前期及时干预、引导,便可降低舆论冲突升级的可能性。除此以外,在网络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具有情绪在前真相在后的特点,因此关注网络舆情的情感动向同样很重要,要“依据情感分析技术,全面准确把握社会舆情内蕴的情感和思想内核,把握公共危机事件社会舆情博弈的内在规律,解决情感动员和价值引领的难题^①。”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及主流媒体与群众间的互动机制,使互动渠道成为民众的意见箱、出气筒、求救门。

第四,以法律手段规范自媒体行为,培育自媒体行业的自律与理性自觉以提升相关从业者的媒介素质和信息传播责任感。与主流媒体相比,自媒体信息来源更广,渠道更多,信息更全面更丰富也更原生态。自媒体新闻可能比较粗躁,但是更新鲜,常常被认为是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而非新闻制造。传统的主流媒体不再是社会舆论议题的主要来源,自媒体时代网络才是舆论议题传播的主要阵地。但是,从自媒体本身的运行逻辑来看,自媒体服务的是流量而非官方权威,这就意味着不能对自媒体传播正义有过高的期待。因此,首先,必须矫正主流舆论与自媒体舆论对立论的认知偏差。自媒体似乎总是以主流媒体的“对立者”身份存在,喜欢和主流媒体唱反调、对着干。主流媒体一直都是由国家所掌控的,以传播时代主流价值观为使命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所以,主流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大多以真理的形态呈现,具有理性、权威、规范的特点,并且更倾向于正面报喜。但是,自媒体舆论更多的是民间群众对网络热议事件所发表的个人看法,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且具有情绪化的特征。自媒体舆论多以揭短亮丑、批评否定为手段,更倾向于负面报忧,标榜自己是专门为“森林”除病虫害的“啄木鸟”。不可否认,有些自媒体还是有理性而客观的分析的,但是,自媒体和主流媒体的社会关注点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对新闻事件的评判视角也不同。在这样一个多元社会讲求合作共赢,二者共生才能起到平衡和中和作用,自媒体和主流媒体在很多方面应该互为补充。其次,在不断完善自媒体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建立自媒体管理的长效机制。目前来看,我国对自媒体的管制更偏重于对违规行为的管理与惩罚,并没有形成完善的行为倡導體系。因此,必须加快自媒体行业价值引导工作,提升自媒体的道德自律水平,不断健全行业法规,使相关监督部门有法可依,缓解自媒体平台“把关人”缺位问题。同时,自媒体从业者也应遵守法律底线,不断规范报道行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新闻传播理论素养,使之成为自媒体从业者自觉的内在要求。再次,要培植自媒体主体的理性自觉。自媒体舆论本质上还属于社会心理水平较低层次的社会舆论,所以,其不可能摆脱盲目、非理性和偏激等缺陷。就像德国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说的那样,如果大众以匿名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群体之中,就极有可能导致个体理性的缺失以及严重的从众心理。因此,自媒体舆论参与者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在看待自媒体中的热点事件时要抓住事物的本质与真相,唯物辩证地去分析社会现象和问题,避免使批判流于情绪化、表象化,自觉克服“带节奏”“标题党”“蹭热度”等不良行为,使网络舆论更趋于理性、客观并真正为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最后,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教育,建立权利与义务辩证统一的权利义务观。马克思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②权利的拥有以改造义务为前提,权利是自觉改造义务的结果。公民自身也应该意识到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自觉树立人民才是历史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社会责任意识基础上培育个体的权利意识与担当精神,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公共治理中来,从而避免将生活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将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政治原因。

(责任编辑 万旭)

① 李国、高敬文:《论公共危机事件中舆情治理的数据驱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7页。